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大西农民军 五次攻克重庆始末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编

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

大西农民军 五次攻克重庆始末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 纲 编著

重庆地方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八月

编 辑 说 明

大西农民军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发展起来的一支农民革命队伍。这支队伍在张献忠(后期为李定国)等人的领导下，在推翻明朝封建统治政权和抗击清兵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大西农民军于一六四四年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农民革命政权，多次攻克川东重镇重庆，给明、清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写下了光辉的革命篇章。

在明末清初以来，全国各处保存着大量的有关大西农民军在重庆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和重庆、四川的地方史，很有参考价值。

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大西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始末；二、张献忠入川作战地方志资料选抄；三、张献忠农民军文物资料简编。本书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纲同志编辑、整理的，在文字上我们作过一些删节，不当之处，由编者负责。



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

“西王之宝”玉玺

(重庆市博物馆供稿)

目 录

太平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始末	(1)
第一次攻克重庆	(1)
第二次攻克重庆	(7)
第三次攻克重庆	(11)
第四次、第五次攻克重庆	(12)
张献忠入川作战地方志资料选抄	(18)
一六三四年(崇祯七年、甲戌)入川作战	(19)
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丁丑)入川作战	(23)
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己卯)入川作战	(25)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甲申)入川作战	(39)
攻克川东各府州县	(39)
夔州府	(39)
攻克重庆	(40)
重庆府	(55)
遵义府	(66)
直隶达州	(72)
攻克川西各府州县	(74)
攻克成都	(74)
成都府	(81)
龙安府	(90)
直隶绵州	(92)
攻克川南各府州县	(97)
叙州府	(97)

嘉定府	(112)
雅州府	(126)
直隶泸州	(134)
直隶资州	(135)
直隶眉州	(139)
直隶邛州	(140)
攻克川北各府州县	(143)
顺庆府	(143)
保宁府	(158)
直隶潼川州	(162)
大西农民革命政权的建立及其政策	(170)
大西农民革命政权的建立	(170)
镇压宗室世族的政策	(171)
知识分子政策	(171)
经济政策	(174)
文化卫生政策	(176)
民族土司政策	(177)
张献忠在抗清战争中英勇牺牲	(179)
姚黄十三家	(184)
张献忠农民军文物资料简编	(187)
西王之宝	(188)
西充县印	(189)
南郑县印	(190)
西充县练兵守备关防	(191)
芦山县印	(192)
骁右营总兵官关防	(193)

潼川府经历司印	(195)
南川县医学记印	(196)
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	(197)
都统之印	(198)
大顺通宝	(200)
西王赏功、赏功致宝	(202)
兴朝通宝	(203)
大顺铜镜	(204)

大西农民军

五次攻克重庆始末

大西农民军曾在明末清初先后五次攻克过重庆。第一次是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第二次是在公元一六四六年（大西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第三次是在公元一六五〇年（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第四、五两次是在公元一六五二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考察清楚大西农民军五次攻克重庆的历史情况 及其地位作用，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史、西南各族人民的抗清战争史和重庆地方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次攻克重庆

公元一六四三年（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张献忠率领农民军在湖广之荆州与老回回马守应合营，部队力量进一步壮大，“势甚盛”。^①接着就沿长江而上，进军四川。张献忠何以要在这时率领大西军向四川进军呢？看来目的有二：其一，是为了彻底摧毁明朝在四川的统治政权。在这之前，张献忠虽曾四度入川作战，但四川的明朝封建统治政权并未被彻底推翻；其二，则是要在四川建立根据地。这正如汪兆龄于一六四三年底，在张献忠召

开的大西军军事会议上所说：“若欲改号正位，养威蓄锐，莫如秦、蜀。然欲取秦，必先得蜀以为根本；根本既固，然后北伐，四征天下，不足定也。”^②在这之后，张献忠派往重庆城内说降的代表也告诉明朝守城官员，农民军之进军四川，是为了“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③

公元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农民军攻克夔州（今奉节县）、云阳，二月，夺取万县。“自巫（山）至万六百里。其时，文武官弁……皆逃矣”。^④

为了使部队得到休整，作好进攻重庆、成都等地的作战准备和观察崇祯帝朱由检南迁之议是否变为行动的形势，张献忠在万县留驻了三个月。部队经过在万县的休整补给，于五月下旬自万县出发，分水陆两路继续进军。由水路沿长江而上的农民军部队在四十万人以上，由张献忠亲自率领，坐大船百余艘，“悬黄旗，书‘澄清川嶽’大字”。^⑤“健斗者二十余万，负载者倍之，置横阵四十里，左步右骑，翼舟而上”。^⑥农民军于五月二十六日，在离万县上游四十里之湖滩打败明官军参将曾英后，连克忠州、丰都、涪州等川东沿江重要州县，于六月十七日进抵重庆下游之铜锣峡，形成对重庆的进攻态势。

重庆古称巴郡，以长江、嘉陵江“自朝天门合流三折而成巴字，故名”。^⑦南朝梁武陵王萧纪又在此置楚州。到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改楚州为渝州，因其地在渝水（即嘉陵江）之旁而得名。到了宋代，在渝州的赵谂，因反叛被杀，又改渝州为恭州。宋孝宗赵睿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才改恭州为重庆。因宋光宗赵惇初封于恭州为恭王，该年他又由恭王即帝位，以表示再次庆贺之意。重庆城建于嘉陵江和长江交会的石山之上，峭壁险绝，三面临水，构成天然屏障，只有西南山脊一线可

通佛图关。城墙顺山势而筑，居高临深，孤崎江中，险厄天成，宛如龟之翘尾。古早有“天生重庆，铁打庐州（今合肥）”^⑨之称。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有城门十七，九开八闭，以为“九宫八卦”的象征。^⑩这十七道城门的开闭情况是：朝天门（开）、翠微门（闭）、通远门（开）、金汤门（闭）、定远门（闭）、南纪门（开）、凤凰门（闭）、金紫门（开）、仁和门（闭）、太平门（开）、储奇门（开）、大安门（闭）、临江门（开）、洪崖门（闭）、千斯门（开）、福兴门（闭）、东水门（开）。^⑪在重庆下游四十里，有悬岩临江，易守难攻，被称为重庆东面门户，以岩悬石如铜锣状（或说以水声似铜锣声）得名的铜锣峡。^⑫在重庆上游，有两山壁立，约束江流的猫儿峡。离城十里的佛图关，更成为重庆西南的陆上要襟。古人有诗云：

军驻严关扼上头，凭栏百里望皆周。
群山翠点高低列，两水清涵上下流。
地险我何防进退，城孤彼自爱羁囚。
一时纵目还生喜，釜底游鱼可待休。^⑬

离城四十五里的二郎关，“万仞深壑，一门壁辟”，又是佛图关的锁钥。

重庆，又是明末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重庆城内，除设有巴县县署外，还有府一级的官署。川东货物贸易大都集散于此，真是“市廛鳞比，万瓦云连”。

正因为重庆具有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所以明末西南一带的官僚地主都把它当作躲避农民军打击的安乐窝。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五子被封于汉中的瑞王朱常浩，“以重庆天险可据”，^⑭伙集关南道陈羽白和陕南、陕西一带的官僚地主，在阳平关守将赵光远所领两万军队的护送下，自汉中逃到重庆。“陇西

士大夫多挈妻子从之”。^⑩“避难者又数万”。^⑪四川巡抚陈士奇，早在新上任时就檄告四川各地要“严守城池”，^⑫以防御农民军的进攻。一六四四年，张献忠进军四川时，陈士奇正值被撤职返里，路经重庆。他“自以为知兵”^⑬，仗恃重庆的险要军事位置和“有饷数十万”^⑭等物资条件，接受蜀王朱至澍的命令，亲自在重庆设防。他一面下令将江北、南岸之船只全部征调至重庆城边，一面在铜锣峡“宿重兵以守”，^⑮同时又“檄参将曾英屯涪江，扼水路，副将赵荣贵驻梁山，扼陆路，^⑯“征石柱（秦良玉）援兵”。^⑰

面对着陈士奇的上述设防，于六月十七日到达铜锣峡的农民军，虽然以优势兵力，进行强攻，仍可突破敌人在铜锣峡的防线，但逆水而攻，必然要付出较大的牺牲代价，显然没有多大必要。于是，张献忠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一方面命令在铜锣峡与敌人接战的农民军部队继续佯攻，以迷惑牵制敌人，一方面却亲自率领精骑在铜锣峡口南岸的大兴场登陆，由小道“疾驰一百五十里，破江津县”，^⑱迅速夺得在江津的船只。张献忠命令船只将骑兵渡到江津对岸之德感坝，沿德感坝至重庆的大道，迅速赶到佛图关前设下埋伏，而自己则率领船队自江津沿江而下，直指重庆。农民军在顺利通过猪儿峡后，只经过大半天时间，即于六月十八日出敌不意到达重庆城与佛图关之间的菜园坝登岸，并直插两路口，截断敌佛图关守军与重庆城之交通要道。敌佛图关守军见此情况，仓惶向重庆城内撤退。早已埋伏于佛图关前的农民军骑兵，乘势夺取了佛图关，卡住了重庆陆路上的咽喉，堵死了重庆守敌从陆上逃跑的去路。^⑲这样，铜锣峡“反出其下，兵士惊扰，守者不知所为，遂溃。”^⑳铜锣峡很快为农民军所控制，重庆城已落入农民军的严密包围之中。敌守城将领见

092388

形势危急，还想出城“背城一战”，乘机逃命。不料陈士奇不许。为了争取守城敌军的投降，张献忠派出骑兵绕城喊话，宣传政策。但明巴县知县王锡不但拒不投降，还在城上向喊话的农民军骑兵发炮袭击。张献忠骑马与农民军将领们在城外认真观察了重庆形势后，决定再次派人入城说降。入城说降的农民军代表向敌人明确交代了政策，指出，只要投降，可以保证生命安全。陈士奇等不但不放下武器投降，反而无理杀害前往说降的农民军代表。这时，张献忠才决定发起进攻。农民军首先进攻南纪门。但由于城墙太高，而城基又全是石头，挖掘地道进行爆破的方法难以进行。加上敌人不断以火、石、滚木、沸油袭击攻城部队，云梯登城也未奏效。经过侦察，发现通远门城下是土。农民军战士们立即顶着木板，冒着敌人的袭击，接近城根，挖掘地道，准备爆破。前面的战士负伤、牺牲，后面的战士迅速补上。重庆附近的群众也积极前往配合，甚至参加挖掘地道。六月十九日，黑云四布，挖掘作业加快进行。地道挖通到城基下面后即填入火药。农民军又以大圆木用铁皮包裹，将中心挖空，填装火药铁子千余斤，“射以火箭。焰起，地裂如山崩”。^⑩六月二十二日辰时，城崩十余丈，砖石皆飞入云际。通远门转角楼被轰破。敌转角楼守将卞显爵被炸死。农民军奋勇冲入城内。至此，号称“天险”的重庆，前后只花了六天时间即为农民军攻破。^⑪

农民军入城后，立即逮捕了原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关南兵备副使陈璫、重庆知府王行俭和巴县知县王锡等官僚地主。重庆卫指挥顾景，听到农民军攻入城内的消息后，跑入瑞王府，要瑞王朱常浩骑上他的马，企图乘乱向城外逃跑，亦被农民军拦截逮捕。^⑫重庆城破之前，陈璫也曾打算出城逃跑，因受陈士奇阻拦未遂。陈士奇，福建漳浦人，天启五年进士。曾任明礼部主事、

四川学政、右佥都御史等职。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代廖大亨为四川巡抚。后明朝中央认为他只会纸上谈兵，以“不称职”，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二月撤换，以川北道龙文光代之。农民军逮捕陈士奇后，在其吏胥家中查出他隐藏的库银达四十二万多两。为了争取他们投降认罪，即使是对陈士奇这样的反动官僚，张献忠也还是“好语劝降”。为了把易服混杂在群众之中的反动官僚地主清查出来，张献忠“悬重赏购百姓认之。各官遂无得脱者”。^②张献忠在演武场审问他们，问为什么不早降时，有一官吏伏地回答说：“权不在己，乞垂鉴怜”。^③陈士奇等顽固抗拒农民军的争取，最后张献忠才下令判处瑞王朱常浩、陈士奇、陈璫、王行俭、王锡和重庆卫指挥顾景等死刑。在惩杀朱常浩等时，天空出现乌云雷电。有人以为这是天不许杀。张献忠发怒说：“由老子杀人，与天何涉？”^④他立即命令农民军战士架起大炮向天轰击，顿时云散天晴。

农民军到重庆后，公开宣布打击的对象是朱家宗室和反动官僚地主。“能杀王府乡绅封府库以待，则秋毫无犯。”^⑤农民军所至，“势如破竹”。^⑥四川各州县“皆望风送款。”^⑦

有的封建史家说张献忠在重庆任意杀人，“城中数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⑧这显然是捏造诬蔑。从时人刘道开所写《巴陵王子美传》记载他的族子在演武场亲见张献忠审判陈士奇等人的情况可以证明，农民军清查惩办的只是少数宗室和反动官僚地主，并未伤及一般老百姓。现将该传摘抄一段于后：

“余自辛巳居乡，去城三十里。六月十四日入城，晤子美于南纪门，相对叹息。余曰：‘事不可为也，盍作变计乎？’子美曰：‘城亡与亡，万无逃理。’余曰：‘公即当死，宗嗣

不可不全。’子美领之。乃托其门人密护公子出。余与子美洒泪而别。是月十八日，贼抵城下。差一骑绕城说降。子美诟骂，自发炮击之。至二十二日辰，城陷。贼坐演武场，缚瑞王、陈巡抚、关南道陈璫、重庆知府王行俭及子美至。贼问何不早降。陈抚齿已打落，含糊不成语。有一人伏地曰：‘权不在己，乞垂鉴怜。’子美奋起以足蹴其背云：‘大丈夫死则死矣，乃向盗贼求活乎！’时暑甚，贼各给茶一盏。某人接茶，子美夺而掷之，骂不绝口。贼大怒曰：‘汝安得速死。’命以钝刀剐之，凡三日夜乃绝。……余有族子在旁亲见之，非风闻也。”^⑨

为了继续发展入川作战的胜利，张献忠只“驻重庆十二日”。^⑩七月四日，即拔营分水陆两路向川西进军。水路沿长江而上直取川南重镇泸州；陆路沿永川、隆昌成渝大道直指四川省会成都。同时，又命令农民军将领刘廷举戍守重庆。^⑪

第二次攻克重庆

张献忠率领农民军于八月九日攻克成都后，即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⑫以成都为西京，自称为西王，以原蜀王府正殿为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但是，正当张献忠着手巩固和加强大西政权的时候，四川各地那些“初惧加兵，……争先送款”^⑬的官僚地主分子和逃跑隐藏的原明官军将领却勾结起来，在南京弘光政权的支持下，发动了公开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当是时，曾英、李占春、于大海起合州；王祥起遵义；杨展起犍为；曹勋起黎州；大学士王应熊缟素誓师达州。金事马乾行抚臣事，传檄讨贼。也若遂宁司马

昌大器、西充巡抚李乾德、宜宾总督樊一衡、内江户部范文光、邛州举人刘道贞或奉诏或承制以出师”。^⑩

曾英，原籍福建莆田。“从父宦成都”。张献忠农民军于公元一六四四年进军四川时，他曾要求四川巡抚陈士奇给他一千军队参加抵抗。陈只任命他为守备。不久，又才被陈士奇提升为参将，“与守道刘麟长守涪以扼江”。^⑪曾英先后在湖滩、涪州与农民军作战失败，并被“砍伤其颊”，与刘麟长逃往南川。因被一反动和尚隐匿，才逃脱农民军的追捕。这个和尚“以千金资英招募”，^⑫又在督师王应熊、巡抚马乾的支持下，火并了“以鬼道募兵甚众”^⑬的刁化神，加强了力量。“一时蜂起之众皆归之，众至数万、船千艘”。^⑭由于“献忠之去重庆，本不置兵”，^⑮农民军重庆守将刘廷举力量十分单薄，公元一六四四年八月，原明达县兵备佥事马乾率兵攻陷重庆。公元一六四五五年（大西大顺二年、清顺治二年）正月，曾英又纠合刘麟长，“率兵出綦江”，^⑯攻陷了重庆。

农民军重庆守将刘廷举向成都大西军总部告急。张献忠认为“重庆要害地，不可失也”。^⑰他立即命令抚南将军刘文秀率兵三万向重庆进发。二月，到达合州，以多功城为老营。三月十八日，刘廷举率领农民军一部由陆路攻佛图关；刘文秀另率农民军一部出合州由水路向重庆进攻。刘廷举遭到于大海的阻击。刘文秀也受到张廷宪的阻击。而曾英却率五百军队偷袭了农民军在合州多功城的老营基地。接着又在佛图关、亭溪激战。农民军相继失利，只好撤击战斗。

曾英由于偷袭多功城得手，又在佛图关、亭溪取胜，不仅被提升为总兵官，而且被封为“平寇伯”。年仅二十六岁的曾英，拥“众至二十万”，^⑱“气益骄”。^⑲他以重庆为据点，“取遂

宁之盐以赡军”，“凡诸营不与同心者，即并之，亦不复禀应熊号令”。⁵⁸“由是兵皆抢劫，自叙、泸至重、涪，掠粮至一月”。⁵⁹重庆附近的綦江、璧山、铜梁、合州、江北、长寿等州县的粮食、牛马被曾英的军队抢掠一空。曾英气焰十分嚣张，甚至打算伙同参将王祥向成都发动进攻。

公元一六四六年（大西大顺三年、清顺治三年）十二月，由于大西农民军守朝天关大将刘进忠的叛变降清，张献忠在川北抗清的军事部署情况被泄露，加上张献忠骄傲轻敌，致使在西充县的农民军指挥部遭到了叛徒刘进忠所领清军的突然袭击。张献忠匆忙出战，不幸于十二月十一日牺牲在西充凤凰山。⁶⁰

张献忠的突然牺牲，给大西军的抗清斗争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四将军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继承张献忠“联明抗清”，“毋为不义”⁶¹的遗志，决定收缩部队，撤到川南、贵州、云南地区，继续坚持抗清战争。

四将军带着农民军部队，由川北南下，沿途州县，早已被曾英等反动官僚地主武装抢掠一空，征集粮草十分困难，只得“沿途杀马充饥”。⁶²有的部队甚至“绝粒十余日”。⁶³定北将军艾能奇所率领的部队，行至渠河，与曾英派出的一千多侦察部队发生遭遇战。艾能奇在孙可望、李定国所领主力部队的支援下，奋勇冲杀，一直将敌穷追至重庆。

农民军部队来到重庆朝天门嘉陵江对岸的江北嘴下营。宽而深的嘉陵江和长江却拦阻了前进的道路。盘踞重庆的曾英，早已强行将北岸的船只搜抢到南岸和城边去了。时间十分紧迫，形势使人焦虑。必须迅速打通渡江攻克重庆城的道路。就在这十分紧张的时刻，具有无畏胆略和高超游泳本领的抚南将军刘文秀，向农民军指挥部提出了由他负责率领小部队涉水强渡嘉陵江，夺取

船只，运送部队过江攻取重庆的建议。刘文秀在大西农民军中以“善抚士卒”，且有超群游泳技能和水上作战指挥经验闻名。他在江河海湖之中，“如履平地，顷刻可数十里”。^⑤他站在江北嘴高处，观察到对岸重庆城内之曾英部队，“各兵纵饮市肆，无防御意”，^⑥麻痹轻敌的情况后说：“彼恃长江而不设备，易视口口可乘也。”^⑦刘文秀随即率领少数农民军战士，不顾江水寒冻刺骨，跃入江中，很快游到对岸，夺取了敌人的船只，返回北岸，将大批农民军战士运送过江，一举突破曾英布下的防线。与此同时，由陆路进攻佛图关的农民军部队也打败守关敌将李定、余仲等，迅速攻破佛图关。这时，事先秘密潜入敌营的农民军侦察人员也在敌军营中放火大烧。农民军战士们在攻城战中，“无不一以当十”。^⑧敌军顿时大乱，号称有二十万众的曾英反动武装“顷刻瓦解”。^⑨曾英和他的后军副将熊梦瑞皆被农民军战士砍死江中。其部将李占春、于大海等，率残部沿长江逃往涪州。险要难攻的重庆山城，又一次被大西农民军攻克了。

大西农民军这次攻克重庆，消灭了当时四川最大的一股反动官僚地主武装，给妄图趁清军入侵之机大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四川反动官僚地主势力以沉重打击；同时又扫除了农民军南下川南、滇、黔，坚持继续抗清前进道路的主要障碍；农民军攻克重庆，“所获粮食辎重不可胜纪”。^⑩这些被缴获的曾英国积在重庆的大量作战物资，使部队得到了充分补充，为继续进军川南提供了物质条件。

农民军攻克重庆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立即举行了军事会议，“商议由遵义入黔固守”。^⑪（时遵义为府，属四川省版图）。部队在重庆休整三天后，即起程向綦江进发。